

读书

D U S H U

2012

下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杂志2012年合订本 / 《读书》编辑部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4
ISBN 978-7-108-045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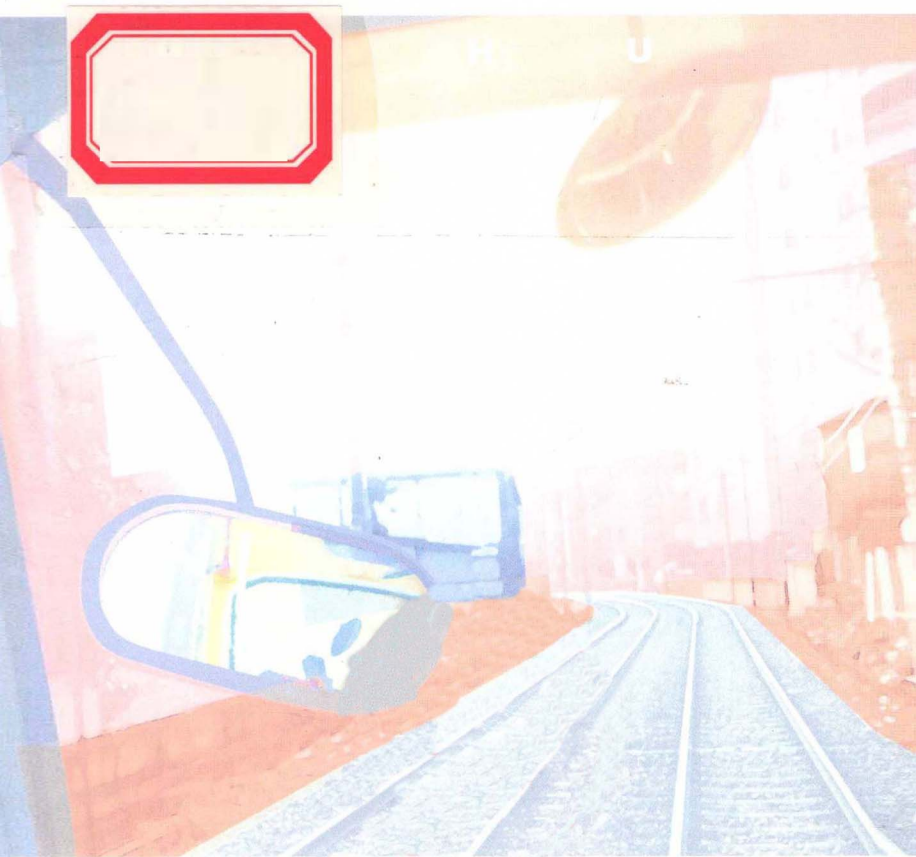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098号

编 辑 《读书》编辑部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装 订 北京博丰伟业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0千字
定 价 100.00元 (上、下全两册)

读书

2012



专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八十年

张维迎 理念决定未来

万俊人 重说学统与知识谱系

尹晓亮 “拥核”还是“脱核”

陈徒手 文件中的王瑶

刘再复 《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

暴发户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暴发户”在历代中外文学作品中都不是正面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都是靠高利盘剥起家的暴发户。中国小说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儒林外史》里的万雪斋，也都是暴发户的典型。这一类暴发户，姑名之曰“聚敛暴发户”。

“聚敛暴发户”大抵起自卑微，因为机缘凑合，又善于钻营，积聚起大笔钱财，但素无文化，又急于挤入上层社会，不免出乖露丑，为人耻笑。他们唯一的护身法宝就是钱财，因此炫富以显示身价，贿赂以买通权势，一时成了被钱撑得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

“聚敛暴发户”之外，又有“权势暴发户”，他们本无安邦治国的本事，只因

逢迎有方，因而升迁有道，如《水浒传》中的高俅之流。因为从无政治素养，又全无廉耻之心，待他们掌握了一定权势，便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信用宵小，残害忠良，没有不敢做的事情。是一批被权撑得可以胡作非为的人物。

在利益驱使下，两类暴发户可能相互勾结。前者借用后者的权势，便于聚敛；后者依靠前者的手段，坐享钱财。围聚在他们周围的还有一批傍钱或傍权以分沾利益的篋片之流，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最后几乎都呈现出这种上下勾结的贪婪，权钱互用的腐败。

“暴发户”现象——这是考察历史不宜忽略的视角。

《读书》与“读书人”和“知识人”

刘梦溪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八十年3

刘梦溪 《读书》与“读书人”和“知识人”

梁小民 我与《读书》

梁治平 “《读书》服务日”忆旧

张维迎 理念决定未来 著译者言11

茅于軾 市场过程的含义 著译者言16

张海燕 司法：“创新”抑或“诠释”？19

张晓山 见证历史 植根现实28

华智亚 夷歌数处起渔樵37

万俊人 重说学统与知识谱系 著译者言42

金文兵 《十慰》：来自异乡的消息55

尹晓亮 “拥核”还是“脱核”63

杨耕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双重逻辑73

李零 太阳不是无影灯(下)78

品书录87

方以智与《物理小识》(马丽琴)·译在旅途(黄忠廉)

沈 洁 革命之后：“五族共和”的另一种叙事 ...94

陈 峰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104

陈侃理 读《〈春秋〉与“汉道”》109

陈徒手 文件中的王瑶118

刘淑玲 人文精神的标本130

门小薇 游宦生涯中马致远的出世之思140

刘再复 《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147

郝田虎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158

赵汀阳 漫画72

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封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八十年

《读书》与“读书人”和“知识人”

刘梦溪

三联书店在我国文化生态的背景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始终是知识分子的朋友。就文化传承来说，她把古和今、旧与新连在一起；就知识生产而言，她是连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一座桥梁；就文化交流来看，她不愧为交通古今中西的文化集散码头。

特别是三联的顶门刊物《读书》杂志，更是独特中的独特。

现在各类刊物多得不可计数，但可以称作读书人的家，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的，只有《读书》杂志。不过如今的《读书》杂志，也不得不面临“朋友”会越来越少的局面。因为真正的读书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后，是有一个读书人阶层的，但他们读书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科举。读书的范围也很狭窄，一切围绕“五经四书”来旋转。这样的读书人其实已经开始“异化”，《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史笔。倒是晚清迄于民国百年以来，确实渐渐有了读书人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分解和弱化。为了专业研究而读书的人多了，无特定目的闲适读书的人少了。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们自然不必把读书和“无聊”必然地联系起来，但真正的读书人，我以为一定要与功利阅读相区隔。

同样，具有充实义涵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物剧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成。但不能不承认，专家多了，思想者少了，学者多了，知识分子少了。

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西方有具体的界定方法，大体是除了专业成就之外，还需要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发表见解。中国古代的“士”，解释起来颇多歧义，但其中有的解释，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多少有一些吻合之处。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就是孟子在另一处说的“尚志”。齐国的王子有一次问“士是做什么的？”孟子回答说“尚志”。又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可见所“志”者“道”也。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那么所谓“恒心”，其实就是对“道”的不动摇的坚执。另一对“士”的解释，是司马迁记述齐国的稷下学派，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多人“不治而议论”。一条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一条是“不治而议论”，这两个条件很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

但中国今天的知识人士，有“恒产”者越来越多，有“恒心”者越来越少。其实“恒产”多了，“恒心”也就难以维持了。而且现成的“官位”也常常摆在知识人士面前，不为之所动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太少了。一旦有了“官位”，“不治而议论”便无法成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越来越少。本来《读书》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知识分子少了，就是《读书》的朋友少了，出现门庭冷落的情形，正不足怪。

然而《读书》依旧还是《读书》。不管读书人如何的减少，她仍然是读书人的家，哪怕是只有一间阁楼大小的家。知识分子的数量虽然锐减，她们接纳朋友的热情却丝毫未遑稍减。这一点，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还是如此。她门所“尚”之“志”，始终没有改变。《读书》的这种品格十分难得。读书人少了，知识分子少了，讲“学问”的却日见其多了。而且近一个时期，大家蜂拥而上，一起比赛着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来讲“国学”。我注意到，《读书》杂志没有赶这种时

髦。国学的根基，主要是经学和小学，马一浮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其苦心孤诣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前些时有一个提法，他认为与其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如使用“知识人”的概念。因为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涵义展开得不是很充分。而“知识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以关于“读书人”和“知识人”的话题，能否在《读书》杂志上有所讨论？还有，最基本的文本经典，包括古今中外的文本经典，《读书》杂志如能细水长流不间断地有所介绍与诠释，窃以为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文化长策。

我与《读书》

梁小民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到北京来读书。大概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报刊亭看到《读书》，被她朴素、大方的封面吸引买了一本。读过之后感到与“文革”中读的《学习与批判》和当时的正统刊物完全不一样，有一种清新而活泼的气氛。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我所敬仰的学者撰写。以后只要看到《读书》就一定要买回来读读。

大约是在一九八〇年，《读书》编辑部的王焱到北大来找一些研究生座谈《读书》，并约请大家为《读书》写文章。当时的座谈会就在哲学系研究生的一间宿舍里举行，参加者大约有十来人满满坐了一屋子。参加者都是我们那一届的各系研究生，我记得有钱理群、温儒敏、刘笑敢、张隆溪、胡平等。这些人现在都是“大腕”了，但当年还是默默无闻的学生。当年王焱极为儒雅、谦虚，他介绍了《读书》的宗旨、风格，希望我们支持《读书》，为《读书》写文章。那个会没有瓜子糖果，没有茶水饮料，但开得十分热烈，气氛极好，好久没有参加过这么务实而亲切的会了。

受王焱的鼓励，我也就不知深浅地向《读书》投稿了。先是写一些“品书录”中的小文章，我记得自己介绍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等。这些文章都发表了，给我以很大的鼓舞。当研究生时，厉以宁教授曾以他和罗志如教授合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为内容开过一门课，并组织我们进行课堂讨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二年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又认真读了一次。阅读中，感到这本书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有许多新意，于是就想写一个书评。当年的思想界还没有现在如此开放，许多传统的框框还没有被打破，想写的许多想法不敢写出来，但仍想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写一点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东西。

《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自然是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讲帝国主义传统的思想框架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本书我上大学时就读过几遍，但读完《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之后，深感《帝国主义论》只是一本政治著作，以帝国主义的垂死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尽管当时我还没想到从根本上否认这个观点，但感到它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个别观点仍然是可以探讨、发展的。顺着这个思路我写了一篇题为《一本崭新的书》的书评。我所强调的“新”是思想与观点的新。我的书评就想探讨当年许多人思考的“帝国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问题。根据书中的论述，我提出这就在于英国通过各种政策调节使“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英国经济崩溃的力量是“英国全民族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及资产阶级民主意识”，以及“福利政策的作用”。这篇文章于一九八三年发表在《读书》第一期上，以后还被《中国日报》译为英文转载。

在《读书》发表了我第一篇五千多字的书评给我极大鼓励，以后沿着这条路子写这种借书谈自己思想的书评，直到今天。

当时整个学术界对西方的社会科学仍以批判为基调，当年考研究生时我的专业名称就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学习一段以后深感这种做法的荒谬。尽管这是绝对主流，而且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时高时低，且有一批左得可爱的人拿棍子随时准备打击不同声音，但我深感这个误区不破，学术没法发展。于是就在几经思考之后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开放》的文章。这篇文章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言论来反对一概批判的做法，主张有批判有吸收。表面上是公正兼顾，而且没有违背革命导师的教诲，实际上是要以学习、吸收为主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读书》上。我沿着这个思想，又写了不少文章，越写越“赤裸裸”了。我记得有一篇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

九十年代初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期间深感经济学发展之快，我们之闭塞，回来后写了一篇《重要的还是学习》，在《读书》发表之后受到好评，据说李慎之先生夸奖了这篇文章，直到十多年之后还经常有人告我说他们读这篇文章所受到的冲击。大概也由于这一篇文章和其他文章我在一九九七年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二十八人的名单。我记得这个名单上许多人都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由此可见《读书》对自由之追求。

我喜欢《读书》的风格，她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又包容、宽厚，让作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受约束而写自己爱写的文章，坚持自己对或不对的思想。即使在“八九风波”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风格。我在美国时听说有人以《读书》为线索来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而且写成了博士论文。我没有去查证这一说法，但我相信《读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影响力。以后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这段历史时，绝对不能不重视《读书》。

从美国回来后，我深感自己的数学基础决定了我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决定写通俗类的文章普及经济学知识。所写的许多文

章陆续发表于《读书》。以这些文章为主，我的第一本文集《经济学的开放》收入“读书文丛”中，一九九九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读书》不仅为我发文章，而且帮助我写文章。记得当年我曾想写一个“西方经济学系列”，写过几篇而且也发表了几篇之后，王焱告诉我《读书》的风格是轻松、活泼、有趣，要让大家休闲时躺在床上也读得津津有味。回想我写的不少文章还是学究气浓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文风，现在看来，努力付出了，进步也是有的，这就要归功于《读书》给我的帮助。

在王焱之后和我联系的是贾宝兰女士。她为人忠厚，工作极为认真，对我们这些作者，既热情帮助，又真心相交，我的所有文章都是她作为责编发表的。以后又认识了编辑部的其他朋友，我深感《读书》编辑部作为一个整体，有思想、有风格，极为认真尽责，其中“五朵金花”早已在读书界和思想界大名鼎鼎。

《读书》不仅发表了大量优秀文章，而且还组织作者的交流活动，无论是专题研讨也好，“读书日”也好，都是读书人交流的好机会，参加这些活动不仅让我认识了更多的人，而且也获得了许多思想，得到了不少启发。这种活动“清茶一杯”，但大家感到极为愉快而有益，每次都空手而来，满载而归。

现在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加之外出讲课多，给《读书》写的文章少了，但每期《读书》我都认真看，从中仍然能感受到她当年的那种风格。年轻一代不仅继承了老《读书》的传统，而且把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使《读书》能与时俱进，永领思想界之新潮流。

《读书》是三联书店创办的，她的风格正体现了三联的宗旨，她的成功也是三联对文化贡献的一部分，我与三联的友好关系，《读书》就是最重要的纽带。人要有归属感，要有心中的偶像，要当“粉丝”。我永远三联和《读书》的“铁杆粉丝”，愿意在三联和《读书》的引导下不断进取。

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庆，《读书》编辑部的朋友约写文章，因为我是“老作者，老朋友”。这样说，让我觉得责无旁贷。写点什么呢？想到三联书店，就会想到《读书》杂志，想到《读书》，就会想到“《读书》服务日”，想到那些单纯、热情而充实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学子，如果有人文、社科方面的兴趣，更不用说其中自认为有思想者，大约案头都备有《读书》，否则，其思想视界和文化趣味就会受到怀疑。这本三十二开的书评月刊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不过，对我来说，《读书》当时提供给大家的，不只是知识、观念和思想，还有人生际遇，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我有幸成为《读书》的作者，自一九八五年始。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一些特定原因，当时《读书》的作者，差不多可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而成为《读书》的作者，就意味着成为这个知识群体的一员，意味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交往空间。我的许多朋友最初认识就是通过各自发表在《读书》上的文字，而且，也容易因为这种作者身份而引为同道。这种友朋和同道间的交往，因为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时，三联书店还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楼内，“《读书》服务日”就在那里举行。除了展新书，服务日并无主题，它更像是一道风景。一间房，若干桌椅，几杯清茶，一群读书人，那就是“《读书》服务日”。去到服务日的，不必是《读书》的作者，甚至不一定是《读书》的读者，但那个日子，那个场合，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去“《读书》服务日”的人，或为谈事，或为交稿，或为见人，或者，没什么具体事，只是到那里坐坐、看看、听听，随便见什么人，总不会一无所获。《读书》当时的编辑们，王焱、吴彬、赵丽雅、贾宝兰、

杨丽华，会在那里招呼来者，通过她们介绍，新来者也可以很快结识新人，融入谈话。那时候，编辑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更接近于朋友和同道，而少职业色彩。记得某个夏日中午，不知什么人提议，一群人跟着赵丽雅，到她在东总布胡同的家里，上上下下地参观，然后在树荫下天上下地地闲聊。又有一次，在服务日上聊到午饭时间，杨丽华便请大家到附近的咸亨酒店，边吃边聊。我记得，那里的菜味道不错。还有一次，也是在服务日，午饭之后，大家意犹未尽，相约要跟一位朋友去他家里参观他的藏书。我与那位朋友初次见面，不知道同去是否唐突，正犹豫间，那位朋友却招呼说，愿意来都来吧，大家都是读书人。于是，一众人等便骑了车，浩浩荡荡地去了。那位朋友家住南锣鼓巷炒豆胡同，他的名字叫赵越胜。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经他引荐，我还参加了一个当时颇为活跃的“编委会”，一个有更紧密联系的年轻知识群体。而我发现，那个群体的成员，差不多都是《读书》的作者，而且，“编委会”的出版合作者，就是三联书店。

那是一个心灵尚未腐化的年代，年轻，热情，开放，向上，充满朝气。虽然物质还匮乏，但是精神饱满；思想虽不够深刻，但质朴有力，理想不坠。《读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读书》杂志，三联书店，还有她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和那个时代一起成长起来的。对今天的人来说，要理解《读书》与其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读书》当时的那种影响力，已经不太容易。因为，那不只是关于一些人和一本杂志或一个出版机构，而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

《语文杂话》 朱自清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闻一多

《英诗的境界》 王佐良 《读书与治学》 胡适

《北京城杂忆》（修订版） 萧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陆续刊行

理念决定未来

张维迎

自一九七八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认同。

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不相信企业家的作用，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

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

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方式不可能在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中创造出来。

改革失败论者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种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与他们的结论相反，我认为，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它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的国企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

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上复活，本已放开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什么改变中国》这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做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和改革停滞与倒退的现实。我希望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一九七八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二〇〇四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二〇〇四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

这时候，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所发表的言论，对引导人们理